

山以志传：民国雁荡山的山志书写与名胜塑造*

赵鹏团 徐 鹏

提 要：山水志不仅是山中世界的历史书写，其本身亦是山岳历史的一部分，是山岳形象和山居意义的重要源头。民国时期，乐清雁荡山进入国家名山叙事体系，民国《雁荡山志》在其间扮演重要角色，作者蒋叔南的编撰行为与大众传媒、旅游文化、金石风气、宗教活动、山乡士绅发生关联与互动，逐渐确立其书写雁荡山的话语权威，以一个高度文本化的“雁荡山”取代客观自然的山水言说，形塑了人们之于雁荡山的文化认知和旅游体验。民国时期雁荡山的山志书写与胜迹塑造提示我们，山水志领域存在着历史书写与名胜建构传承的关联性，以及尝试文献文化史研究视角和路径的必要性。

关键词：民国《雁荡山志》 历史书写 名胜塑造 文献文化史

近年来，历史文本中的地景书写引起广泛关注，在山水志领域，受“历史书写”“史料批判”等理论和方法影响，相关学者倾向于将山水志视为含有建构成分的文本，释读其中存在的选择、规训、干预、创造等因素，考察知识、权力、社会、文化等如何作用于书写。^①但从文献文化史的视角来看，文献是“中国文化史中一股力量”，“文献书籍不仅仅是一种人类沟通的媒介，更是一种塑造文化的手段”^②。山水志作为山中世界^③演进过程中的文化情节和事件，不应仅作为一个被建构的对象进行研究——志书本身即山岳形象和山居意义的重要源头，山水借助志书的书写传播引发读者兴趣，成为游览目标，产生地方意义，进入历史传统，上升至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景观，因而成为名胜。易言之，山水志研究有必要突出社会、文化的转向，从文献塑造社会的角度观察历史书写与山中世界的双向互动：作为山中世界的历史文本，山水志书写过程中固然充满了各方因素的建构与博弈；但作为使山中世界“被看见”的媒介文本，山水志也在不断丰富山岳的景观内涵、建构社会群体的旅游认知、影响山居人群的权力秩序，进而赋予自然山水以特定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地位。

* 本文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浙江山水志研究”（24WH23—4Z）阶段性成果。

① 主要成果如钱杭：《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历史授权——萧山湘湖史上的〈英宗敕谕〉》，《史林》2004年第6期；马孟晶：《地志与纪游：〈西湖合志〉与晚明杭州刊刻的名胜志》，《明代研究》2014年总第22期；舒瑜：《山志言“山”——以高翥映〈鸡足山志〉为个案》，《民族学刊》2013年第3期；李晓溪：《寺庙权力中心的转移与佛教方志的文本建构——以清代〈黄梅老寺中山志〉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9期；彭滢燕：《径山的法脉传承与历史叙述》，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耿金：《建构与解构：明代浙东湖水纠纷中的利益表达——以上虞皂李湖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7年第4期。

② 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3期。

③ 山中世界，既指涉自然景观，也包括人为建置和山居人群，以及围绕山岳进行的诗画题写与交游行为。本文用“山中世界”一词涵概山岳自然层面的景观和社会层面的活动与建构。

在这方面，民国《雁荡山志》可能是一个颇有趣味的“观测点”^①。今日的乐清雁荡山虽被看作久负盛名的5A景区和人文地理目的地，但其进入国家名山叙事要晚至近代^②，一个重要节点是1934年东南五省周览会，雁荡山被民国政府确定为五省核心景区之一，由此交通畅达，声名鹊起。这一时期雁荡山中发生的众多事件，或多或少都与家居乐清大荆镇的蒋叔南及其所撰《雁荡山志》有关。^③

蒋叔南，字希召，世居雁荡山东北端的大荆镇，早年参加革命，与蒋介石、袁世凯、黄郛、黄群等均有交集，后军旅蹭蹬，解甲归乡，经营雁荡山、打造个人旅行事业以为资本。他认为之前历代山志“几有全行推翻之处”^④，有意识地改变前志书写模式，在山中、山外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改变雁荡山形象和山中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文从蒋《志》对于前志的改写问题切入，分别考察各方面因素如何促成山志文本的改写，又以其新书写重塑山岳的地理空间、历史空间、宗教空间和社会空间，从而将山水志文本置于山中世界，还原为山中世界形成演化的历史现场，在方志文献与山水景观之间探索文献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通道。

一 景观书写与地理空间重塑

山志志山，需要介绍山中的地理格局、景点分布、景物样貌等情况。蒋叔南之前，雁荡山可详考的山志修纂凡9次，宋元3种为单篇，是滥觞之作。明代有释永昇《雁山集》、朱谏《雁山志》^⑤、徐待聘《雁山志胜》，清代先后有李象坤《重辑雁荡山志》、施元孚《雁荡山志》和曾唯《广雁荡山志》。

前述诸志^⑥“山水”“建置”门类所遵循的空间结构和采用的叙述文法相对一致，呈前后接续、渐臻详尽的趋势。对此，曾唯的解释是，景观书写因循山中高低错落、聚合分散的地理形势，“此乃天然形势，即隐寓天然次序，无可移易”^⑦。在蒋《志》中，这种不言而喻的默契被打破，作者绘制了迥然不同的山景叙述图式。

其一，前志默认共同的游山路线：从今日乐清市向北，在芙蓉镇白岩村一带进山，自西向东行进，依次为西外谷、西内谷、东内谷、东外谷，至大荆镇一带而止，其中西内、东内两谷景点最密集，也最摇曳生姿，号称“二灵一龙”的灵峰、灵岩、大龙湫均汇集于此，是雁荡山景的

① 参见蒋叔南重修，卢礼阳、詹王美校注：《雁荡山志》，线装书局，2009年。另有民国永嘉区征辑乡先贤遗著委员会钞本，稿本残缺不全，收康有为、李洙、徐道政、刘绍宽所撰序言与蒋叔南自序，保留完整目录，存例言、雁荡风景一览表、总志、山水、建置、物产共7卷内容及蒋叔南自撰的诸篇山中游记。部分内容与卢、詹校注本不同，特别是校注本“艺文”二十一至二十六目、录均佚，此钞本所存文章弥足珍贵。以下简称“民国乡著会本”。

② 自隋唐开山以迄明清，除南宋短暂兴盛外，雁荡山主要出现于地方性的诗画游记中，检视《唐六典》江南道“天下名山”、道教洞天福地名录和《四库全书》所集江南名山叙述，均不见雁荡之名，民国前期是雁荡山从地方胜景走向全国名山的重要节点。

③ 俞剑华《二南》一文中说：“在民十七八年之顷，开发名山的风气，可谓盛极一时。吴稚老许静老之于黄山，储南强先生之于两洞，蒋叔南先生之于雁岩……尤以储蒋二先生均以一人之力，□而不舍，卒能使两洞雁荡□名胜，大暴于世，慕名往游者，亦相继不绝。”（《申报》1948年3月2日，第9版）

④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23页。

⑤ 朱《志》影响最大，朱谏歿后，章元梅、侯一元补辑朱《志》，更名《雁山续集》，县令胡汝宁又将两部书合为一帙，删去人物后予以刊行。经过增删的朱《志》，在嘉靖到崇祯年间多次重刻、递刻。

⑥ 为叙述简便，下文在总称蒋《志》之前诸志时，称为前志。

⑦ 曾唯：《广雁荡山志凡例》，曾唯辑、张如元校笺：《广雁荡山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页。

主干。四谷北侧，又有南阁、北阁二支。山志文本序列之外，以徐霞客为代表的历代游记作品中，雁荡山东西内外四谷和南北两阁的“分镜组合”同样清晰可见。^①由此推论，大约明清时期的历史文本在如何游览雁荡山上，共享着同一套话语体系。

蒋《志》对前人的叙述图式提出质疑，选择以今日灵岩景区北缘的山峰百冈尖为核心，把雁荡山划分为东、南、西、北四谷，并按这种四方格局展开叙述，使得“山水”“建置”门类在景观的分布状况、叙述次序、串联方式、观察角度等方面与前志大相径庭。如此一来，峰峦泉石在文本化的地理空间中发生位移，如小剪峰、瑞鹿峰、卓刀峰、剪刀峰在前志中分属西外谷、西内谷和东内谷，在蒋《志》中则统一归入南谷，雁荡山东西长、南北窄、线性游观、景点在中间聚合的既有格局被打破，南北方向的旅游空间得到拓展。

同时，前志在叙述单个景观时，往往沿着行进方向，采用自西向东观看的视角，景观与景观之间用“某景在某景东”这样的方式进行连缀。不易连缀的，取附近景观作为参照物。蒋《志》设定的四方格局，则采用回环往复的行进路线来叙述景观，这就带来景物特征书写的显著变化，如雁荡山最具标志性的灵峰，在蒋《志》叙述图式中就与前志标注的周边景观失去呼应和联系。尤其是雁荡山峰多为拟态化山景，以从某个方向看来形肖某物著称，这种拟态往往取决于观看的方向、角度以及周边景物、光线的掩映，峰回路转，拟态效果就会发生变化。可以说，不同的空间布局和游山线路，带来的是雁荡山景的全新塑造。

其二，蒋《志》与前志的分歧，还在于如何建立雁荡山的叙事中心。一座山岳传名于世，需要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把它和普通山水区分开来。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进过山的游客而言，更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远足的理由、一份评议的谈资、一派悬想的幻景。在前志之中，雁湖是雁荡得名之由，也是重要的山岳书写主题。^②雁湖位于雁荡山雁湖岗顶，峰顶曾有大湖，湖水经年不涸，芦苇丛生，秋雁归时常栖宿于此，故称雁湖，又称雁荡。秋雁来归，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恒久命题，山顶有湖，芦荻萧萧，更增奇丽苍茫之意。古时文人墨客或登临、或卧游，雁湖都是他们赋写雁荡山的核心题材。徐霞客初游雁荡，用时四天，两天时间都在搜访雁湖。^③

蒋《志》中，雁湖意象被刻意淡化，百冈尖成为新的山岳枢纽和叙述中心。蒋叔南对前志提出尖锐批评：“于山之面积、山之体积均属茫昧”^④，“非惟未至百冈尖，且未至雁湖，而茫焉执笔者也”，认为“百冈尖为雁荡之最高，且为雁荡之最中……四谷罗列于下，百二峰环而拱之，皆曾玄也”^⑤。既然雁湖这个传统中心界定有误，全山景观和叙述中心都需要重新梳理铺排。蒋叔南专门撰写《百冈尖记》，收入志书“艺文”当中，文章说登上峰顶后，“目光所及，已无山可与我比肩者”，并以百冈尖顶远眺为基准线，将全山划分为东、南、西南、西、北5条支脉，认为“全山自此尖发脉……登尖瞭望如指诸掌”^⑥。

其三，对比曾《志》和蒋《志》，在如何阐释雁荡山美学价值上，两者有明显不同的视角和立意。曾唯纂志的愿景是“订传闻之误，搜隐秘之踪”，通过诗文汇辑和征史正讹展露“雁

① 参见徐宏祖撰，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第117—125页。另，徐霞客此游因时间限制，未至北阁而还。

② 参见曾唯：《广雁荡山志凡例》：“雁湖为山之主”，曾唯辑，张如元校笺：《广雁荡山志》，第7页。

③ 参见徐宏祖撰，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第9—14页。

④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23页。

⑤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92页。

⑥ 蒋叔南：《百冈尖记》，蒋叔南著，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黄山书社，2009年，第292—293页。

山真面目”^①，体现的是文献博富的书写向度，诗文考据甚至超越纯粹景观的图写体验，成为山岳更值得被赏鉴的对象和内容。这并非曾唯的个人爱好和独得之秘，而是清代山志编纂的普遍追求，翻检其他地区的名山之志，如《盘山志》（康熙刻本）、《泰山志》（嘉庆刻本）、《华岳志》（道光刻本）、《摄山志》（乾隆刻本）、《黄山志定本》（康熙刻本）等，都在诗文征稽上不吝笔墨，主张“稽之往籍，参之近今，虽牧竖樵夫之一话一言，莫不详察而切究之，旁参互证，务求的实”^②，“庶免蹈空之诮”^③。由明至清，山水志编纂渐趋成熟，也愈益走向“充满纂修者人际网络共同记忆的纪游集成，既是纪录游踪，也能提供给不在场者追忆、想像或卧游”^④。

相对于以文人之笔叙自然之景，蒋叔南尝试建立“于实地写实事”^⑤的旅游导引式书写。这里以雁荡山的3个景点为例，比较曾、蒋两部山志的书写差异：

（一）含珠峰：

曾《志》：王献芝《记》：“双石壁峙，中含圆石，曰含珠。”《李志》：“在凌云寺右，拔地数千尺，状如蟹螯，衔一圆石如珠。”《施志》：“在梅雨岩西南。两峰屹立，中间相隔，上下各尺余，有石嵌其中，大如斗，圆明若珠。东为凌云寺。”^⑥

蒋《志》：在宝冠峰北谷口，峰高四十余丈，上如蟹螯开张，中嵌圆石，希奇秀丽，冠绝山中。^⑦

（二）梅雨瀑：

曾《志》：何白《记》：“两石插云对峙，飞瀑自崖巅垂下，半壁一石特坟起，瀑势春激，潦射乱注，霏霏如烟雨。”明王光美《梅雨岩观瀑》诗：“瑟瑟寒飊万壑松，奔流直下最高峰。平分斜日摇飞蜨，半洒青天起卧龙。石绣苔纹埋赤字，云开山影堕芙蓉。长歌罢酌扶筇去，回首烟霞信几重。”^⑧

蒋《志》：在梅雨潭上，瀑流遇凸石，激为细雨之状，故名。^⑨

（三）飞泉寺：

曾《志》：薛季宣《赋注》：“在能仁寺北一里。”《朱志》：“宋天禧二年僧从吉建，熙宁元年赐额。元末迁于戴仁峰之北绝顶上。明洪武二十四年归并双峰寺。”《施志》：“元僧豁庵迁东山戴仁峰北，去故址五六里。明并入双峰，后僧不缘重建。国朝顺治丁酉，僧藏白、梵表同建。雍正间，僧全觉复建。”韩则愈《杂记》：“飞泉寺坐落最好，诸刹风水无逾于此。今寺僧尚有二十余众，衣食丰足。”国朝方尚惠、施元孚俱写有《登飞泉寺记》，元朱希晦、明项守祖俱写有《飞泉寺》诗，国朝林文焕有《登飞泉寺》诗传世。^⑩

蒋《志》：在飞泉岭上，宋天禧二年僧从吉建。熙宁元年赐额。元末迁于戴仁峰之北绝顶

① 曾唯：《广雁荡山志》，“叙”，第4页。

② 李榕：《华岳志》，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第7册，第2页。

③ 金荣：《泰山志》，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第4册，第169页。

④ 马孟鼎：《地志与纪游：〈西湖合志〉与晚明杭州刊刻的名胜志》，《明代研究》2014年总第22期。

⑤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23页。

⑥ 曾唯：《广雁荡山志》，第26页。

⑦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120页。

⑧ 曾唯：《广雁荡山志》，第36页。

⑨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122页。

⑩ 参见曾唯：《广雁荡山志》，第86—87页。其中引方、施、朱、项、林的诗文篇幅较长，兹不具录。

上。明洪武二十四年归并双峰寺。(朱《志》)后僧不缘重建。清顺治丁酉,僧藏白、梵表同建。雍正间僧全觉复建。(施《志》)今久无僧居,其往事不可考。现为灵岩寺兼管。^①

蒋叔南致力于消解曾《志》将雁荡山“人文化”的书写,认为前志淡化地理记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错误百出,不可胜指”,“几有全行推翻之处”^②,从而将传统的文人制作浓缩为近乎辞典条目式的说明文字,对山中的景物、人事作白描勾勒。日人西上实曾从美术视角观察这一问题,他注意到蒋叔南虽然屡邀艺术家进山,却不赞成对雁荡风光进行艺术化处理,而是希望他们进行类似照相式的图写,与当时注重雁荡山想象空间的郑昶、黄宾虹等人呈现出明显的审美分野,这一论述可与本文观点相印证。^③

上述三点所考察的蒋氏“于实地写实事”的书写,不仅是发生在雁荡山历史纂述空间内的纠葛,它同时辐射到国内各大名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山水志书——蒋叔南以旅行家自许,效仿徐霞客,遍访浙闽鲁豫京晋徽鄂苏诸省名山,撰写一系列山中游记,实勘详述各地尚未开发完成的胜景遗踪,标注进山路线,介绍栖宿游观攻略。在这个过程中,他一方面罗致各地山水志书和地图游记,“入山以当罗盘”^④,一方面又以自身笠屐之所经与前人志书之所述相校讎,诟病旧志所载不足为凭:“《武夷山志》不足为游山之助”^⑤,“《普陀山志》凌乱无章”^⑥,“余读(黄山)《山志》及记游所载,似于实地上均有差误”^⑦,“《泰山志》……则大误矣”^⑧。在此语境下,旧时的山志文献被有意无意地对象化了,它们与雁荡山旧志共同被赋予一种虚泛不实的整体印象,或“文字雕琢”,或“向壁虚造”,尽多“笼统模糊之词”,这些大量无差别的反面案例共同烘托蒋叔南“于实地写实事”,详尽记录游览搜访的线路、闻见和各类登山注意事项,使“后有好游者,不难追求而至也”^⑨的新式书写。

志书书写的原始动力可能源自纯粹的地理关怀,但引导人们前往游观、塑造人们山水体认的却往往是写就了的历史文献,亦即文献文化史所强调的文献书写对于知识传统的建构^⑩,在旅游世界里,人们通常需要借助山志,才能使外界标定他的游踪,感受他与山岳的“合景”“同情”。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差异化的山志书写,为人们“重新看见”“重新识读”雁荡山提供了可能。那么,蒋《志》的景观书写怎样作用于山中世界、创造新的雁荡旅游认知和体验呢?

这关涉到当时国内兴起的旅游热潮和传媒界对于旅游题材的宣传开发。民国前期,中国旅游走向近代化,从一种文化活动转变为一项产业,不仅政商两方面重视旅游开发,新闻媒体亦致力于经营旅游题材的作品。

1916年,著名出版人张元济注意到蒋叔南编订的《雁荡名胜》图册。此时蒋叔南刚刚致仕,

①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130页。

②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23页。

③ 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编:《黄宾虹研究文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9—15页。

④ 蒋叔南:《天台山游记》,《蒋叔南集》,第6页。

⑤ 蒋叔南:《武夷山游记》,《蒋叔南集》,第86页。

⑥ 蒋叔南:《普陀山游记》,《蒋叔南集》,第113页。

⑦ 蒋叔南:《黄山游记》,《蒋叔南集》,第141页。

⑧ 蒋叔南:《泰山游记》,《蒋叔南集》,第204页。

⑨ 蒋叔南:《黄山游记》,《蒋叔南集》,第139、141页。

⑩ 参见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3期。

图册是他由沪返乡时拍摄的一组雁荡风景照片，张元济托陈叔通居中接洽，以100元购入图册版权^①，将书名改为《雁荡山》，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很快，他的《雁荡山》二集、三集也由商务印书馆梓行。之后，蒋叔南又出版《雁荡新便览》《蒋叔南游记第一集》。前者再经修订，更名《雁荡山一览》，交西泠印社出版，这部书的修订出版，得到《申报》赵叔雍大力支持。^②同时，蒋叔南凭借个人的旅游经历和山志编纂，成为民国旅游第一刊——《旅行杂志》的座上宾，在这本重量级杂志上发表多篇游记和旅游研究文章。这些书籍和文章，引用不少蒋《志》书稿的内容，如《雁荡山一览》在框架上是志书的缩微版，介绍东、南、西、北四谷布局，蒋《志》中《山水》《建置》《游法》亦略见其中；而《续雁荡十记》等文章又载于志书“艺文”之中，《百冈尖记》则系统阐述新山志的叙述框架……它们使大量外界读者得以认识蒋叔南、了解并参与讨论蒋叔南的山志书写。

由于蒋叔南针对前志的质疑和改写发生在大众传媒营造的公共空间之内，蒋《志》与前志的对话就不局限于关切山志编纂的山中社会^③，而是透过书籍杂志走进千家万户，传播到浙江省内外，形成远非前志所可比拟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民国时期社会公众对于雁荡山景的认知，重新界划厘定了雁荡山旅游的空间布局和游山线路，确立了蒋《志》之于雁荡山的权威地位。

1916—1935年是蒋《志》编纂、成稿、传阅、增订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名流不同程度地受到蒋叔南影响，前往雁荡山观光，如政界的屈映光、黄炎培，出版业的张元济、王福庵，文坛的林纾、郁达夫，高校的洪深，艺术家黄宾虹、俞剑华，军界的姚琮等。这些人在当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来到雁荡山，宿于蒋叔南家中，阅读其所纂山志，沿着山志建构的地理空间和游山路线观览——黄炎培《之东》一文所述游山路线^④，完全符合《雁荡山一览》所绘“交通大概图”^⑤；夏承焘、吴鹭山的雁荡纪游词，往往借蒋《志》释读游山路线与山中景观。很多名家还主动为山志补充资料，题辞赋文，留下墨宝，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代为宣传^⑥，以“主流舆论”身份完成了对蒋叔南雁荡山书写的审读鉴定，故山志虽未正式面世，江浙沪一带的官绅已经赞不绝口。时人刘绍宽评价说：“（蒋叔南）数十年宴游栖息于其地，于

① 参见张元济：《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4页。

② 参见蒋叔南：《雁荡山人旅行日记（一）》（《旅行杂志》1934年第8卷第8期）所记11日至15日之事；又，蒋叔南歿后，《申报》刊发悼词《蒋叔南逝世》（《申报》1934年7月29日，第13版），赵叔雍撰写《追悼蒋叔南先生》（《旅行杂志》1934年第8卷第10期），都溯及《申报》为蒋叔南出书提供的支持。

③ 这与古代山志书写只能依靠后续修志者的接受和认同来逐步作用于山中世界截然不同。近代之前，一部志书对前志的质疑、改动能否得到认可，取决于当时参与修志的各方人士和嗣后阅读、修订、抄录、刻印、续纂志书的历代社会群体，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同，新的书写才有可能在后世得到延续，作者的书写愿景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④ 参见黄炎培：《之东》，王稼句编：《风日晴和：民国浙江游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9—377页。

⑤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373页。

⑥ 比如康有为、蒋维乔等题镌碑刻；俞剑华、黄宾虹为蒋叔南别墅绘《仰天窝图》等，郑昶、林纾也留下画作；赋诗题文，有蒋维乔、黄炎培、郁达夫、傅增湘等；拍摄照片，有陶昌海、王文魁、王少棠、郁子峰、曹翔海、张菊生。黄炎培夸奖说“吾辈来游雁荡，全恃蒋叔南”，为蒋叔南题写屏联“乡国安危容小试，名山管领亦奇才”（参见黄炎培：《之东》，王稼句编：《风日晴和：民国浙江游记》，第353、360页）。

山之形状位置了然胸中，回视前人山志，谬讹百出，遂起而重修之。夫以超旷一世之才，写其胸次具有之丘壑，其为有此山来之空前杰作，可无疑矣。”^① 1932年，蒋叔南和陈经就雁荡山观光事业的书写问题在《旅行杂志》上发生论战，《旅行杂志》就此事发表编者按：“叔南先生徜徉雁荡有年，游者视为导师，谈雁荡者，靡不论及先生，故所言无不确当。”^② 由此可见，此时蒋《志》作为山岳媒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雁荡山在社会意识层面的再现，直接形塑着新的山岳胜景的生成。

二 金石书写与历史空间开拓

倘若把历代雁荡山志编纂看成一条历史通道，以明清山志为入口，蒋《志》为出口，那么出口处和入口处相比，除上节所论的“外在审美”转向，记述内容上也有很大变化，尤其是增设前志未有的“金石”门类。

蒋《志》“金石”共6卷，前3卷收钟鼎摩崖54通、石刻32通、碑碣9通；后3卷为补遗，杂录各类石刻、题文、拓本48通。题镌时间自南朝至民国，多为宋元以后之作。内容种类颇多，有题名、题字、题诗、作序、记人、记事、记游；书法形式灵活，正书、行书、草书、篆书、隶书兼备。

蒋《志》称前3卷源自其父蒋炯的旧作：“先父燧堂府君，曾有《雁荡金石志》之辑。右志三卷，即其原稿，以事稽未印行。兹照抄录，以存先迹。”^③ 细查前3卷内容，除收录题刻文字外，还附有许多编者的按语，这些按语是由蒋叔南补写，还是其父原文，已经很难一一分辨。但其中出现的“龙湫寺”“龙湫庙”^④ 两个地名，不见于蒋《志》，或系其父所书；又有“天台选山堂诗石刻”，在按语后另出“希召按”^⑤，可知前一部分按语亦是蒋炯手笔。基于这两条线索，考虑全志书法尚称明晰，可以推断蒋叔南所述属实，前3卷应该就是《雁荡金石志》原貌，出于对先父的追念和尊崇，蒋叔南没有对原稿进行修葺剪裁，而是“兹照抄录”，将其父所收古刻和所撰疏校之辞一并誊写进去。

后3卷“补遗”，则是“希召历年搜剔而得者也”^⑥，相当于其父《雁荡金石志》的续辑。以之与相关文献校核，可以看到其中有13通参考援用戴咸弼、孙怡让的《东瓯金石志》，剩余35通系蒋叔南自行采访增补。

晚清至民国，金石碑刻的学术和艺术价值受到广泛关注。从史学角度言，“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⑦，特别是石材耐久存、难损毁，很多纸本文献中久已湮灭的历史记忆，托付残存于铭刻之中，于是研治金石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显学，上到显贵清要，下及乡绅儒商，甚至很多民国军阀也投身其中。搜访、收藏、制作拓片作为当时士绅阶层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既是一项独特的身份标识，又是累积声望、巩固人脉、拓展社交的重要通道。程章灿指出：“这种学风和士风不仅覆盖了晚清时代从京城到地方、从上到下的广大空间，

① 刘绍宽：《北雁荡山志序》，《瓯风杂志》1934年第12期。

② 参见《雁荡质疑》编者按，《旅行杂志》1932年第6卷第12期。

③ 参见蒋叔南：《雁荡山志》，第236页。又，蒋叔南之父名炯，别字瑞堂，一字燧堂，今乐清市大荆镇人。

④ 参见蒋叔南：《雁荡山志》，第218、219页。

⑤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213—214页。

⑥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236页。

⑦ 赵明诚著，刘晓东、崔燕南点校：《金石录》，齐鲁书社，2009年，第1页。

又因为声气相通、嚶鸣相求，而构成了细密的网状联结。”^①

但具体到雁荡地区，山中石刻题记在蒋氏父子之前一直未专门整理。历代《温州府志》《乐清县志》以及光绪初年的《东瓯金石志》，都只是部分涉及，且多系转录，颇有舛漏，不成体系。^②据光绪《乐清县志》载，清末乐清编纂县志，首度设置金石专类，广为搜罗，唯独遗漏雁荡山区。^③而另外一部由倪启辰编著的《雁荡四谷金石录》，大约晚至1936年成稿^④，此时蒋叔南已经去世。这就意味着晚清到民国中期的数十年时间里，《雁荡金石志》和以之为底本的《雁荡山志》6卷金石辑录，是校论雁荡金石文献方面的孤作。现将其置于当时追逐金石碑拓的社会环境中，就蒋《志》金石书写为雁荡山区域“添加”^⑤的主题和内容略作申论。

首先，志书金石书写把自然山景和历史记忆关联起来。统计蒋氏父子所辑古刻，可以看到雁荡山享誉全国之前，历代已不乏名流入山题写，南朝梁有昭明太子，唐有宰相、刺史，宋有提刑官、知县，元有翰林学士承旨，明清更是自大学士、督抚、御史、六部主事以至知府、知县、基层僚属纷至沓来。其中包括沈括、谢奕修、刘黻、杨慎、孔天胤、张文熙、阮元、江湜、潘衍桐、方鼎锐、梁章矩、唐景崇等一大批载在史册的文坛俊杰。他们既对山水地标进行指认、记注和呈现，也将自身的思想、行迹、诗文、书法等元素注入山间，赋予自然景观以超越现实时空的体验和想象。

蒋氏父子的金石活动，将这些湮没于历史烟尘、遮蔽于林泉深处的记忆提取出来，塑成一种叠加在自然山水之上的新的历史文化景观。据现有文献记载，蒋炯先行铺设了以金石文献开拓山林历史空间的道路。蒋炯除《雁荡金石志》外，似乎别无撰著，能长期执教温、台一带，被大族聘为西席，使张寅、阮陶谔、潘球、徐熙等地方名士执弟子礼^⑥，收获“学问渊博”“乡望卓著”的乡评，离不开他洗剔碑刻、补缀家山的文化功绩。时任乐清知县何士循和知名学者刘师培先后为其书作序^⑦，说明蒋叔南之前，作为蒋《志》底稿的《雁荡金石志》在乐清一带初步建构了雁荡山与金石胜迹的关联性。蒋叔南在20年后收录父作、进行补辑、载入山志，使原本私人化的著述进一步转换为具有特定话语权力和社会功能的公共文献，无疑再次唤起并强化了各

① 程章灿：《玩物：晚清士风与碑拓流通》，《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

② 叶三纯：“见诸历史著述，清戴咸弼纂辑、孙怡让校补的《东瓯金石志》及光绪《乐清县志》对雁荡刻石曾作收录，但多有舛错，且明刻以下皆缺。”（乐清县文化局编：《雁荡山摩崖石刻》，内部资料，1987年，第1页）。

③ 县志《凡例》：“惟雁山地近黄太，劫夺时间，采访视为畏途，所录无几，以俟续修”（光绪《乐清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61册，第9页）。

④ 按，此书未刊印，据高谊所撰《雁荡四谷金石录叙》（高谊著，高益登编注：《高谊集》，线装书局，2013年，第115—117页）落款“丙子十月”，可知书稿大约完成于1936年。

⑤ 这里的“添加”，并不是说为山中增添新的主题和素材，而是当雁荡山中集聚了大量金石题刻时，它就将这座山岳与普通的山川风光区别开来，实现自然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叠加，成为可以追溯文明的记忆空间，从而在更高层面上吸引更广泛的人群前往，更有机会被指认、被传播。

⑥ 蒋炯的执教经历，略见陈亦乐《清末之冠山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乐清文史资料·教育专辑》，1992年，第25—27页）。另，《蒋希召正告天下为仇约三诬讟开赌提灯事请求公判》一文中，亦提到“召先君子教读于楚门王桂苑先生家”（《乐清导报》第17号，1924年6月1日，第4版）。

⑦ 参见何士循：《雁荡金石志叙》，《瓯风杂志》1934年第7期；刘光汉：《雁荡金石志序》，《国粹学报》1905年第8期。

方面对于山中金石景观的记忆和感知。他在山志中设置“金石专场”，标注金石题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把时空交错、散金碎玉的题刻串联起来，系统性嵌入自然山水，形成古与今、名与实、想象与现场、在地与他者等一系列融合与张力并存的文化场景，塑造“山水从金石中见，金石自山水中来”^①的胜迹空间。

其次，蒋叔南把研治金石和旅行事业结合起来。拓录碑文是蒋氏山林旅行的重要目的，据《蒋叔南游记第一集》，他旅行途中访碑密度之高、游记中述碑文字占比之大令人咋舌。^②其金石活动引起广泛关注，曾任浙江省民政长、巡按使的屈映光委托他代为搜访刻石；蒋叔南针对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刻石撰写的《经石峪字迹考》，被收入民国时期编印的《泰山指南》和《泰山游览志》，在山东考古文献层面流传颇广。正是借助蒋叔南的山志书写和旅行建构，雁荡山得以与其他地区的金石景观并举，一道被纳入人文地理目的地序列中进行观照，拓展出新一层级的旅游命题、方式和受众。

随着蒋《志》的书写传播，标志山中历史记忆的题刻得到系统指认和阐释，民国时期雁荡山作为一座金石意义上的胜迹逐渐形成。对士绅阶层而言，金石胜迹与自然山水有着完全不同的旅游意义，薛龙春曾专门考察金石文化所造成的明清两代旅游差异：“总体上看，明、清两代文人对山水的观看及山水中题刻文字的理解存在一些差异。明代文士往往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出游，来将自己与普通游人区别开来；而乾嘉以后，随着金石成为时尚，寻访碑刻亦成为文人旅游的重点。”^③叶昌炽的《语石》描绘了历代文人前赴后继进行添刻的游山胜景——“摩厓漫刻，后来居上，有如积薪。唐贤名迹，宋人从而磨刻之，宋贤名迹，明人乃更加甚焉。”^④当民国《雁荡山志》营造了雁荡山富集题刻的名山胜迹形象后，就赋予了山岳新的价值和内涵，吸引着远近文人前来看山、访碑、留迹。

据方长山统计，温州地区现存摩崖石刻以民国时期最多，且主要集中在雁荡山一带^⑤，这一数据充分说明民国时期雁荡山中气象发生重大变化。从现存刻石来看，其作者在省内以至全国都颇具声望，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于右任、潘天寿、张大千、傅增湘、张元济、丁辅之、王福庵、方介堪、屈映光、梅雨清等更是一时巨擘，其中多数人精研金石书画，他们受到蒋叔南及其山志书写的影响来到雁荡，不仅为了徜徉自然风光，更有意见摩古人的镌写，追加自己的题刻，形成一道道古今唱和的新景观，把之前自然向度的雁荡山水引入中国传统文人最为熟悉、赞赏的社会、历史、文学、艺术等知识审美体系，从而刷新雁荡、定义雁荡，在人文地理的层面上标记雁荡，进一步丰富了山岳的外在形象和内在主题，深度改写了原有的观山格局，在静态的山水空间中添加历史纵深，赋予客观景物以更深刻、更广泛的文化意涵，塑造外部世界对于雁荡山的胜迹体验和文化想象。

① 聂钺：《泰山道里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齐鲁书社，1996年，第242册，第825页。

② 在金石遗存相对不算密集的天台山、黄山、房山、洞庭山四地，总计不足5万字的游记文章中，述及碑版内容高达105处；普陀、恒山等地，石刻题记在文中所占比重更大；至于曲阜、泰山、嵩山、武州山之游，基本内容就是搜访金石之作。据文中所述，对外界流传不广或者较为重要的题刻，蒋叔南尽可能在现场完成拓写或者抄录，至于外界罕见的张廷臣碑记、唐一行禅师墓碑（天台山），北塔院舍利塔题绘（房山），枕流阁题诗（洞庭山）等，都是全文收入游记。

③ 薛龙春：《点缀山林：摩崖石刻与胜迹的塑造》，《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23年第3期。

④ 叶昌炽撰，姚文昌点校：《语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02—303页。

⑤ 参见方长山：《温州碑刻著录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温州文物》2015年第1期。

三 丛林书写与宗教空间营构

天下名山僧占多，留意山中僧道活动、勾画山岳神圣空间是明清山水志书写的重要取径。^①例如万历《九疑山志》、嘉庆《崆峒山志》、康熙《鸡足山志》、康熙《四明山志》、宣统《虎邱山志》、民国《琅琊山志》等，所述诸山虽以自然景观著称，但“仙释”“伽蓝”“寺院”“灵迹”“禅僧”“高僧”“道流”“高僧传”“塔铭”等宗教门类均占较多篇幅，又在“建置”“古迹”“人物”“文集”“诗集”“题咏”“杂志”等类目中大量存录历史上的宗教活动。

宗教文化同样也是雁荡山开发演进的重要资源，从东晋到宋代，阿罗汉诺讵那、全了、行亮、神昭、文吉等高僧大德在雁荡山中辟居、垦殖、传道、建寺，扮演了开山拓荒的角色，是山中世界的重要记忆。但蒋叔南之前诸志因为雁荡山并非五山十刹，多数对宗教主题重视不足，尤其对南宋以后山中宗教活动着墨较少，集前志之大成的《广雁荡山志》收录历代释氏只有29人。施元孚把雁荡形胜归结为“声色性情”，提炼4个方面的精神属性：“长官可节其弛张以适于政，学士可发其志气以深于学，迁客骚人可以破孤闷而平其心，幽人逸士可以畅天机而广其志”^②，并不强调山水胜景与宗教文化驱动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蒋叔南反对前志淡化宗教内涵的书写向度，他认为雁荡山奇秀之姿虽然“本自天成”，但是“点缀端资人力”，一座山岳只有积蓄丰厚的宗教底蕴，才能形成更深沉、更长久、更广阔的影响力。雁荡是“佛堂清净”之地，法教是山灵之所在，其兴亡关乎山岳“百年之气运”^③，作为南戒灵区，历代山志忽视经营宗教资源的做法，以及山中“自元、明以还，人事衰落者，无有已时”^④的情形让蒋叔南十分感慨，他认为雁荡山“精蓝十八，早布四谷”^⑤，拥有悠远的法教传统和良好的发展潜能，希望通过山志书写缀辑山中法脉，丰富宗教主题，重振山岳的神圣空间。

其一，蒋叔南刻画了自己复兴雁荡山宗教事业的行迹。志书金石门类“补遗”3卷中，全文收录蒋炯的《重建果盒桥碑记》和蒋叔南《石佛亭碑记》《重修石梁洞碑记》《修建北斗洞碑记》《坦荡岩摩崖》。这5通碑刻，详细记载蒋氏父子、特别是蒋叔南本人联合宗教人士矢志重建雁荡山宗教空间的举措——石梁洞一时没有僧人可以招揽主持，蒋叔南“暂以持斋念佛者管理之”^⑥；北斗洞，由蒋叔南的族侄宗松道人负责。碑记还显示蒋家两代人与南碧霄寺住持金玉峰过从甚密、互相唱和。

在志书第5卷“建置”和第36卷“艺文二十一”中，蒋叔南着重讲述了自己兴复灵岩寺等庙宇的功绩。据蒋《志》记载，灵岩寺兴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得到宋太宗赐御书、真宗赐额、仁宗赐《藏经》，可谓隆盛一时。至蒋叔南之时，功纯和尚荒废禅修，寺中佣工变卖寺产殆尽，蒋叔南与其弟季哲从功纯手中买到灵岩寺的所有权，赎还寺产，修葺寺宇，遍植松

① “晚明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出现‘中兴’局面，至清中前期仍较有发展。这一时期，大量佛教名山山志开始出现，僧人群体积极参与山志的编纂，另外许多山志编纂者虽非僧人，但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李俊：《明清山志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第115页）

② 施元孚：《雁荡山志》，“自识”，温州市图书馆藏手抄本，时代和版本不详。

③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127页；蒋叔南：《重修雁荡山净名寺募捐序》，《雁荡山志》，民国乡著会本。

④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274页。

⑤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127页。

⑥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273页。

柏,从宁波聘来成圆和尚任住持,将寺产无偿交还成圆,灵岩寺因而得以复兴。^①蒋叔南自许为:“钟鱼嗣响,缙素咸临,此雁荡数十年来所仅见也。”^②灵岩寺之外,他还会同道友金玉峰募建灵峰第一亭、促成灵岩寺兼管飞泉寺、介绍大道教徒金从根住持瑞鹿寺、帮助恢复罗汉寺。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志书有意为雁荡山植入宗派法嗣。可以看到,蒋叔南在山志中载录引介的宗教人物中,除其子侄、亲友外,较具代表性的成圆和尚、式海和尚和静圆和尚,身后均有庞大深厚的宗派背景。

成圆和式海都是天台宗法嗣,与晚清佛门泰斗谛闲法师关系密切。成圆来自宁波观宗寺,是谛闲的弟子,他入主灵岩寺,虽然有赖于蒋叔南的考察聘请,却也离不开谛闲法师的大力支持。成圆在主持灵岩寺寺务之外,还有在山中兴复能仁寺、罗汉寺、普明寺、瑞鹿寺、飞泉寺之功,其中罗汉寺重修得到谛闲帮助,能仁、普明也题为谛闲所建^③;式海来自温州明因寺,谛闲法师曾邀他出任南京僧立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后来驻锡雁荡山净名寺,蒋《志》记述了他重兴净名寺的贡献。^④静圆则来自镇江江天寺(即金山寺),号卧云,又称松月静圆,是民国名僧释妙参的弟子,主修禅宗,曾与蒋叔南合作兴复瑞鹿寺未果。蒋叔南对静圆的雁荡题咏大为赞赏,认为其诗作兼备徐霞客、江湜和端木国瑚“三子之长而更上之”^⑤,将其中部分作品收入志书“艺文”当中。

蒋《志》对于宗教内容的书写,呈现出一种非常“不典型”的文本样态,它时而跳出志乘惯用的旁观者视角,以第一人称作者口吻出现,将宗教活动作为续写前志的重要内容,以强烈的主观意志渲染山中宗教氛围,强化山岳的神圣特质。虽然任何历史文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执笔者思想、性格、意图、处境等因素的影响,但蒋《志》的宗教书写无疑体现了个人意志与书写内容的“强连接”,蒋叔南及其家族的宗教情结内化为文本的底层逻辑,不仅呼应了民国初期山中丛林因缘前绪、兴复旧迹的社会背景,更使自己与雁荡山的宗教建设相勾连,以雁荡山“护法者”^⑥的形象出现公众面前。

那么,蒋《志》何以形成与宗教主题的“强连接”?志书宗教书写作为山岳名胜塑造现场的一分子,这种“强连接”又如何影响到山岳形象的建构,并产生怎样的效果呢?这需要关注蒋叔南与当时佛教界领袖谛闲、印光等人互动唱和这一创作环境,相关文献显示,蒋《志》对于山中宗教景观的强化记述,是作者与佛教人士思想碰撞、交游合作的结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形成雁荡山的“知识共同体”^⑦,分享同一套山中景观的书写价值观和认知标准,共同介入雁荡山宗教书写的视角和资料选择,共同讲述山中的宗教“故事”,丰富并重塑了雁荡山的文化内涵。

① 参见蒋叔南:《雁荡山志》,第129—130页。

② 蒋叔南:《重修灵岩寺募捐序》,《雁荡山志》,民国乡著会本。

③ 参见《中兴雁荡山的成圆法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清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乐清文史资料》(第6辑),1988年;《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浙江通志·雁荡山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2—193、208—209页。飞泉寺并入灵岩管理,载在蒋《志》,其余复建之举,蒋《志》未详。

④ 参见蒋叔南:《重修雁荡山净名寺募捐序》,《雁荡山志》,民国乡著会本。

⑤ 蒋叔南:《雁荡山志》“罗汉寺”条目,第131页,以及蒋叔南《卧云东游诗钞序》(蒋叔南:《蒋叔南集》,第561—562页)。

⑥ 郁达夫将蒋叔南许为雁荡山的“护法者”。参见郁达夫:《郁达夫游记》,上海书店,1981年,第144页。

⑦ 知识共同体是由某一知识领域相互联系的行为体组成。皮特·哈斯认为知识共同体有4个特征:一套共享的规范和原则信念、共享的因果信念、共享的合法性标准、共同的政策实践过程。参见曹云华、周玉渊:《知识共同体方法及其局限性》,《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谛闲法师作为天台宗泰斗，曾在1926年赴雁荡说法，多次与蒋叔南会面，虽然找不到二人交往的详细资料，但根据蒋叔南留意丛林之事，喜欢投止寺庙、结交僧侣的风格，以及上文述及的谛闲引介成圆、式海驻锡雁荡，帮助修复罗汉寺等内容，有理由推断，至少从1926年开始，谛闲与蒋叔南之间就有持续交集。谛闲把蒋叔南所撰山志稿作为案头读物，“除常课外，时与新山志为伍”，称赞蒋叔南是“灵岩檀主”，不难窥见二人当就山志书写、特别是山志中如何强化宗教主题有过不少交流。谛闲为山志作序说：“拟将全副面目装置于五阴瓶中，不卜居士能许我乎。”^①主张借山志书写进一步把雁荡山与佛法关联起来，以佛法开拓、构筑山中文化场，由此大约可以想见当时佛教力量介入并作用于山岳神圣空间建构的情形。

蒋叔南和普陀山法雨寺的印光和尚也十分熟悉，他曾专程赴法雨寺听印光连讲3天法事。^②印光是晚清净土宗名家，同时也是山志编纂的积极参与者，主持重修《峨眉山志》，倡议志山必先志佛，反对“不通佛学之儒士”编纂山志，认为这样是“买椟还珠，敬卒隶而慢主人，只在山之形势变幻处致力，不在菩萨兴慈运悲，拔苦与乐处形容，志山而不志佛，颠倒行事”^③。二人探讨佛法之余，必然也交流如何以山志叙述山中法事、如何以山志书写烘托营造山岳神圣性。共同的事业追求、相契的地理旨趣把蒋叔南和印光联系在一起，把蒋《志》编纂与外部的宗教世界联系在一起，搭建起佛门法脉进入雁荡山的通道。

事实上，在明清两代，雁荡山以至乐清一带始终与佛教特别是北部的天台宗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乐清地方权力秩序与温州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以沿海的瑞安、平阳、乐清3县而论，明清时期瑞安科甲人才济济，乐清最居其末，由于缺少宦途通显的科甲大族，乐清的社会权力由地方宗族和外来宗派分享，后者主要是从东北方向台州一带渗透过来的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佛教力量，彼此的权力空间错杂交置，概而言之，本土的宗族势力更多居于以县城为代表的西乡，而佛教在东乡的雁荡山一带拥有更大话语权。从历史渊源上讲，雁荡山虽然算不上知名道场，但宗教文化与山中世界的联结已成为地方上不可忽视的传统。在民国时期全国宗教活动回暖的大背景下，蒋叔南与宗教力量围绕山志编纂进行的互动交流，重建雁荡山与宗教主题之间的关联，重启宗派力量重新进入山中的通道，使雁荡山的宗教景观再次“被看见”并得到社会上较大范围内的认同和支持，建构并提升了雁荡山的神圣性，加固了山岳传名后世的文化韧性。

四 人物书写与社会空间界定

蒋叔南之前的几部山志，人物传记渐次扩充，从朱《志》所收13人增至曾《志》的95人，作为“在《雁山志》中最为完备”^④之书，曾《志》对于雁山人事的撰述和考订已臻详悉。曾唯之后的续修者，除了覆校前志之失和补叙曾《志》下限后的人物，并无较大发挥空间。但是蒋叔南在没有改变既定编纂体例的前提下，通过大幅度的增删，将志传人物调整到71名，使山中人物图谱发生明显变化。之所以删减前志已传之人，蒋叔南给出的理由是雁山寓贤

① 谛闲的4条引文详见谛闲所撰《新修瓯东雁荡山志序》，《大云》1926年第7期。

② “（蒋叔南）在法雨寺晤印光和尚，终日听其净土宗论，三宿别去”（蒋叔南：《蒋叔南集·洞庭山游记》，第273页。）

③ 释印光：《重修〈峨眉山志〉序》，《印光法师文钞全集》，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2册，第854—857页。

④ 孙怡让著，潘猛补点校：《温州经籍志》，中华书局，2011年，第571页。

“书不胜数”^①，然而前志人物数量并不算多，而蒋叔南删去的也不都是游寓之人，那么，他改易人物传记的行为背后，是否包含有其他方面的价值考量？又是否具备某种现实干预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通过下表，我们对朱谏、李象坤、施元孚、曾唯、蒋叔南所纂山志中的人物进行统计和比较：

部分雁荡山志人物载录情况对照表^②

书名	收录人物	人物数量	增量	减量
朱谏 《雁山志》	胡彦卿、夏元鼎、李孝光、章纶、章玄应、章九仪、章玄槭、杨彦、章魁、木叶老人、偷桃僧、蔓定僧、诺诂罗、全了、景宣、后可	17	/	/
李象坤 《雁山志》	诺诂罗、全了、行亮、神昭、文吉、景宣、后可、从滢、天目礼、木叶老人、蔓定僧、周恢、包雷渊、元禅师	14	8	1
施元孚 《雁荡山志》	谢灵运、张子容、顾况、吕夷简、甄昂、赵抃、刘允升、石牧之、焦千之、周邠、朱熹、楼钥、袁采、金都尉、汤和、王献芝、潘潢、薛应旂、郑善夫、陈仁锡、王士性、徐宏祖、周清源、蒋埴、王十朋、薛季宣、胡彦卿、赵师秀、徐照、徐玘、翁卷、林景熙、李孝光、黄淮、蒋竞、章纶、章元应、张孚敬、侯廷诚、谢省、谢铎、张书绅、朱谏、章元梅、侯一元、李象坤、李实、朱希晦、李敕、章来源、何白、卢景旭、周道麟、方尚惠、蒋光赞、黄大健、搏虎叟、诺诂罗、全了、行亮、神昭、文吉、蔓定僧、景宣、敏行、偷桃僧、净悟、夏元鼎、惠上人、白云、云外、圆魁、大观、明德、正智、释昇、王子晋、芸田仙、宋代隐仙、木叶老人、回道人、包雷渊	82	71	5

① 蒋叔南：《雁荡山志》，第 24 页。

② 部分人物在各志中称名、称字、称号各不相同，为便于阅读，表中予以统一。李象坤只收录方外之人，故只统计其在方外范围内的增减情况。施《志》编纂，以朱《志》为蓝本进行增删，故施氏的增减情况，一准于朱《志》。

(续表)

书名	收录人物	人物数量	增量	减量
曾唯 《广雁荡山志》	谢灵运、张又新、吕夷简、蒋光赞、甄昂、赵抃、范宗尹、周邠、石景立、胡彦卿、朱熹、薛季宣、王十朋、刘允升、楼钥、木待问、翁卷、赵师秀、徐照、徐玑、袁采、戴复古、林景熙、李孝光、陈德永、朱希晦、汤和、黄淮、蒋竞、章纶、张孚敬、潘潢、侯廷诚、张书绅、王献芝、朱谏、侯一元、薛应旂、章元梅、王士性、郑善夫、李敕、方召、章元春、何白、王叔果、陈仁锡、周道麟、徐宏祖、周清源、方尚惠、蒋埴、李象坤、崔应阶、施元孚、诺诂罗、善孜、惟一、全了、行亮、神昭、蔓定僧、后可、本先、文吉、遇安、处谦、士珪、景宣、慧恂、敏行、静悟、元禅师、惠上人、古林、济生度禅师、白云、云外、远梦、大观、明德、受绍、正智、释昇、王子晋、张文君、芸田老人、宋代隐仙、窥镜童、偷桃僧、夏元鼎、周恢、回道人、包雷渊	94	28	16
蒋叔南 《雁荡山志》	王十朋、鲍君任、方如晦、李实、李孝光、朱希晦、仇元梅、章纶、章元应、章元梅、朱鹡、杨彦、朱谏、李敕、吴朝凤、李性、方轩、方召、章元春、章一焯、林培、林宗瑛、干国秀、应廷荣、方尚惠、李可久、郑心韶、包贡茅、毛炳、杨梦麟、蒋希周、曹文昇、张桂萼、包雷渊、黄大健、谷士高、诺诂罗、善孜、惟一、全了、行亮、神昭、蔓定僧、后可、本先、文吉、遇安、处谦、豁庵、士珪、景宣、慧恂、敏行、静悟、若容、元禅师、惠上人、古林、济生度禅师、白云、云外、远梦、大观、明德、受绍、正智、澄公、释昇、大涵、会觉、道融	71	32	55

由上表可见，从朱《志》到曾《志》，虽然人物数量增长较快，但后志之于前志，基本采用“继承+增补”的方式，被裁汰者数量不多，遵循着一条比较稳定的收录标准，即不断补全与雁荡山景开发密切相关者。这个平稳的态势，在蒋《志》编纂中被打破，蒋叔南对前志人物，删

去55人、保留39人、新增32人，改写幅度不可谓不大。^①删去的55人中，除翁卷、侯廷减、方召、周道麟、李象坤、施元孚、芸田老人7人隶籍乐清外，其余都是外籍游寓之人。将这7人与保留的39人、新增的32人进行比对，可以看到留在蒋《志》中的人物，均标注了其在山中的居住方位。显然，蒋叔南按照他在山志第一卷中对于雁荡山“山体”的描述，严格划定了一个山中社会的地理界限，凡在此界限之外者均不属于山中之人，即便是与雁荡毗邻而居、经年游山的本县人士，甚至是李象坤、施元孚这样的山志著述者也不能名列志籍。

应该说，蒋《志》对于雁荡山人物图谱的构建，采用了类似府县志“越境不书”的标准，而非传统山志尽可能涵括游山之人和题山之文、假借人物文章为形胜增色的做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雁荡山窄化为一个界限清晰的地方社会，只有出示山中人的身份标识，才能享有被志乘书写的资格，进入雁荡山历史文化的传承空间。

经过重新界定的山中之人，整体面貌发生变化，蒋《志》所收71人，除3个方技之人外，士绅乡民33人，高僧35人，方内、方外人数等量齐观，宗族、宗派两大群体并峙的特征清晰可辨。关于宗派的讨论已见前文，而方内33人中，突出了雁荡山中几大宗族的身份：李实、李孝光、李性一派的雁山李氏，章纶、章元应、章元梅、章元春、章一焯一脉的南阁章氏，李敕、李可久等北阁李氏，方尚惠、方轩、方召等代表的淀川方氏。新增的仇元梅等人，据光绪《乐清县志》载，亦出身于清末乐清东乡世家。志文之中，尤其对南北阁的章、李两家不吝笔墨。

那么，蒋叔南对于前志人物书写的改动，是否刻意为之，是否关联到了山中社会的权力秩序呢？这里结合蒋叔南所撰文章，展开一点简略的探讨。

他在为北阁李漱芳夫妇寿诞所撰的贺词中提到，其父蒋炯与北阁李氏关系甚好，“常称道北阁李漱芳先生温厚笃实”，自己执教第四高小时曾任李漱芳两个儿子的老师，1922年重病期间，屡蒙李漱芳照料。^②又在《南阁章氏宗谱序》中回忆了蒋氏父子两代人与章氏的交往，特别是父子二人均参与章氏宗谱的编纂，足见亲厚之情。^③这让人联想到蒋氏在山志书写中的一些特殊举动。比如在《人物》中，北阁李敕^④是唯一一个从光绪《乐清县志》全文抄录传记之人，导致一人之传占到乡贤人物记述文字比重的近五分之一。对于南阁章氏，蒋叔南则在《金石》中以“补遗”一卷的体量，全文抄录了《章恭毅公神道碑铭》《广东布政使章公神道碑铭》和《湖口令章千峰先生墓表》，尤其是《墓表》一文，作者在墓址不存、子孙未知、“《二谷集》中及《章氏家乘》均未载之”的情况下，认为“斯人斯文，乌可不传”，特意从《乐清县志》中转录过来。^⑤

有理由认为，作者与雁荡山中几大宗族、特别是章李两家的交往，都切实影响到蒋《志》的纂述。通过严格限定山志人物的记述边界、提升山居家族的比重、增加特定人物的文字篇幅，蒋《志》阐释并呈现了全新的社群图景——章、李为代表的山中大族与前文所述宗教力量一起构成了雁荡山中的权力中枢，而以山志为之立传、为之扬名、并与各方均有交契的大荆蒋氏，无疑也厕身其间，同样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山中力量。^⑥

据民国《乐清导报》报道，1924年乡人仇约三诉蒋叔南参与支持大荆镇财神庙提灯聚赌，

① 由于蒋叔南没有见到施《志》，故李实、章元应、黄大健等载在施《志》而不入曾《志》者，也视为新增。

② 参见蒋叔南：《李漱芳先生暨德配吴夫人六秩双庆序》，《蒋叔南集》，第550—551页。

③ 参见蒋叔南：《南阁章氏宗谱序》，《蒋叔南集》，第563—564页。

④ 蒋《志》写作“李经敕”。

⑤ 参见蒋叔南在《墓表》后所作按语，《雁荡山志》，第265页。

⑥ 戴思哲在《方志条目的垄断现象》中阐述了类似问题，可与本文相参阅。参见〔美〕戴思哲著，向静译：《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9—102页。

带同第四高小学生公开演讲批评蒋叔南，致蒋仇之间发生冲突，蒋叔南曾约束乐清知事、调动当地防营警兵围攻拆毁仇宅。这件事侧面反映了蒋氏在雁荡山地区以至乐清县境不俗的社会影响力。对此，仇约三致电《乐清导报》社说：“夫蒋叔南不过以游记欺人，外界误以为名士。”^①这里所谓“游记”属于泛称，指向蒋叔南对于雁荡山的一系列文字建构，仇氏以本乡人、亲历者的口吻描绘了蒋叔南以山志为代表的文本书写对于山中社会的影响——虽然山志书写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山岳的现实社会空间，但在清末民初乡绅社会的大背景下，“绅士为一方之领袖”^②，蒋叔南将山志作为文化资本，与地方士绅进行交游酬酢，有意识地追溯、挖掘、建构特定的山中乡谊，表扬山中高门大户的敦义行实文章，彰显他们在雁荡山区域社会乃至山岳历史中的身份地位，引导山居群体和外部人群对于雁荡山乡绅群像的心理认知，将他们认作山中社会的主色调和山中话语的主导者，进而起到界划强化山中社会权力秩序的作用。蒋叔南每称雁荡山为“家山”^③，社会舆论目为“雁荡山主人”^④，地方号之“天盖”^⑤，不能不说与其山志书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结 语

本文集中考察民国《雁荡山志》作为历史文本的生成问题，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介入并形塑雁荡山的名山特质和山居意义。中华民族有着从篇卷之中访求文化山河的悠久传统，这使得阅读山志、卧游品题具备了极强的现实代偿性。通过与大众传媒、旅游文化、金石风气、宗教力量、在地乡绅的链接互动，蒋《志》逐渐形成叙述雁荡山的话语权威，将游客、读者融入文本景观与现实地景的交织网络之中，激发引导他们之于雁荡山的体验和想象。某种程度上，一个基于山志的高度文本化的“雁荡山”取代了客观自然的山水言说，构建了全新的地理图景，并成为后世继续开发、阐释雁荡山的基点。对照今日雁荡山，我们不难看到蒋《志》穿越时空的巨大投影，例如金石、寺庙已成为当代雁荡山的重要旅游资源，文旅部门多次拓录编印雁荡山石刻资料，本觉寺、能仁寺、罗汉寺、普明寺、石梁寺、双峰寺、真际寺得到复建发展，灵岩寺更被视作天台宗的重要道场；新编《浙江通志·雁荡山志》对蒋叔南及其志书作了颇多追溯；百冈尖虽然没有被后世认同为雁荡全山的逻辑中心，但作为“全山第一峰”的地位明显抬高等。

进言之，民国《雁荡山志》或许提供了一个在山水志领域尝试文献文化史研究的进路和视角：倘若将山水志作为一个经验性文本，透过志书编纂，观察书写群体对于外在自然的认知和想象，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志书标注自己和自己所处的山水世界，可以看到在历代山水志的接续编纂中，浸透着不同的书写意图和复杂的社会成因，不断形塑、改写着山中空间和景观，在前人履痕上留下新足迹，在旧主题上叠加新内涵，持续强化山岳的历史纵深，塑造更具张力和吸引力的山中世界，呈现从文献到文化的转化轨辙，使一代代人流连忘返的山水胜迹即由此产生。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民国《乐清导报》第17号，1924年6月1日，第2版。

② 徐栋辑：《牧令书》卷16《教化》，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③ 蒋叔南：“雁荡……年来经营，是吾家山”，《蒋叔南集》，第4页。

④ 《蒋叔南逝世》，《申报》1934年7月29日，第13版。

⑤ 蒋叔南：《蒋叔南集》，第674页。